

# 学理、方法和论域：法兰克福学派早期 批判理论述评

唐立新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主要承续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批判的角度和靶向发生了偏移和深化。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和技术理性的全面批判,总的来看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路径。在批判的方法论上,法兰克福学派宗罗百家,跨越学科藩篱,推陈出新。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成果丰富,凸显了批判理论的活力和锋芒。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 唐立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广东深圳 518060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5)07- 0006 -06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1923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格吕堡担任第一任所长,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该所所长,由此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由于纳粹的迫害,社会研究所被迫于1933年迁往美国。1949年,学派主要成员陆续返回德国。1930-1949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也是该学派的发轫期。霍克海默于1937年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明确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概括为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的带领下,法兰克福学派逐渐展开了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

## 一、犹太性、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 靶向

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的批判理论,与其成员的犹太血脉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一点不容否认。“是什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团结仅仅是暂时的?他们所有人都有着某种共性吗?第一代法兰克

福成员组成了一个整体,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要么大都是迫于纳粹的压力而恢复信仰犹太教的人。无论来自上层社会的家庭,还是像弗洛姆或洛纹塔尔那样来自于不那么富有的家庭,他们中最幸运的人也免不了有过社会局外人的经验。他们甚至在1918-1933年的那段时期也无法幸免。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经验是:再恭顺也无法使自己成为社会庇护下的一份子。”<sup>[1](P8)</sup>正是由于相同的犹太背景和惨痛经历,他们走到了一起。纳粹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脱离欧陆,一起逃亡美国。

犹太人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犹太人总是在困境和苦难中寻求真理和出路。犹太人自大流散以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批判和反抗。正如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所言:“犹太人……接受了他周围的世界,他加入了游戏,而且遵守所有的那些礼仪,和其他人一起跳着那种可敬的舞蹈。而且,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是允许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的自由公民,所有社会荣誉和政府职位都向他开放。他可以带上荣誉骑士团的勋章,他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或内阁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法治社会的巅峰的时刻,另一种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

在的社会片刻之间出现了在他们面前,而且将他们拒之门外。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功也无法让他进入那自认为是‘真正’的社会的时候,他对荣誉和未来的虚幻感是怎样的强烈啊!……”<sup>[2](P79-80)</sup>跻身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却普遍遭受“局外人”的歧视,因此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这正是犹太人要竭力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初衷。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源于他们对资本社会的失望和痛恨。犹太人在当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相当的限制、排斥、敌视和残害,很多犹太人沦为无产者或贱民,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他们反思资本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一开始,法兰克福学派就呈现出鲜明的理论路径。格吕堡担任所长期间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途,我们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且我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30年前,我还曾想过要质疑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唯物主义史观。但是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发展教育了我,现在我不再疑惑。”<sup>[3](P8-9)</sup>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信心的同时,格吕堡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着清晰的阐释,他厘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运用经济体系自身的,用来描述某种意识形态的,用来清楚地描述方法论的术语……唯物主义史观并不想对永恒范畴进行思辨,也不想去探究‘自在之物’。它的目的不是揭示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永无休止的变化着的、永远在更新转化着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存在才是它的目标所在。这种转化的最终原因和转化过程所遵循的法则才是它的考察对象……正是那些在经济生活中有组织地起作用的各种物质利益,以及它们彼此的冲突所一同引发的驱动力,促成了社会从低级形态向更完善形态有规律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现象都是经济生活的当代形式的一种反映,同样,所有的历史——原始社会除外——都显现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sup>[3](P10-11)</sup>很明显,格吕堡坚决捍卫和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说,格吕堡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

资本主义在欧美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而周当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历史的批判,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对资本主义,特别是

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达到理论的高峰,形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把韦伯的合理化批判思想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结合起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立场上超越韦伯的新康德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理性原则展开了批判。他把宗教和辩证法融为一体,承续了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思想,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

格吕堡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在批判的维度上已经发生了偏移和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倡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从商品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剖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衍生和发展,并预示了它的灭亡。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展开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从而把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通过哲学变革,实际上批判了从理性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回到历史本身,回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正是在走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资本逻辑与总体性观念呈现出来。”<sup>[4](P32)</sup>法兰克福学派首先也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但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换,法兰克福学派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和技术理性的全面批判。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是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常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立场契合。霍克海默坦言:“批判理论不否认它的原则是由政治经济学这门特殊学科确立起来的,它说明,在人的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交换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紧张关系的加剧,而这种紧张关系在当今历史时代里又必然导致战争和革命。”<sup>[5](P215)</sup>霍克海默在这里直言不讳指出,经济基础导致战争和革命。马尔库塞也曾声称,批判理论与唯物主义关系紧密,甚至断言批判理论不是哲学的体系而是经济的体系。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而裹足不前,而是广泛吸取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基尔凯郭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去补充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的意识形态的文化批评,从而结出了很多理论硕果,如“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

它的人本主义的批判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们不把教条形式作为他们理论的原则——那种教条形式只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们看中马克思的实质：对被异化并产生着异化的社会条件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批判。他们很看重青年马克思的经历。“正在马尔库塞阅读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对他而言马克思才第一次具有了真正的重要性。在他眼中，青年马克思实现了正确的哲学，而且证明了资本主义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而且是威胁人的本质的大灾难，因此，急需的不是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而是总体革命。”<sup>[1](P235)</sup>学派中的弗洛姆鲜明地指出：“十九世纪时期，具有远见的思想家就已经看出，在其繁荣富裕的政治力量的背后，西方谁正走向衰落和野蛮……无论他们采取什么立场，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批判都是以人和历史的宗教-人本主义观为基础的。”<sup>[6](P235)</sup>很明显，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人本主义的批判倾向，从启蒙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吸取营养，力主“主体性哲学”，关心人的发展和成长，反思社会 and 传统，全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二、批判理论的方法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显赫的学术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格吕堡担任所长期间，以实证风格研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兼容并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西方和东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它所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视同仁，既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稿，发表伯恩斯坦等人的文章，也发表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的文章。因此，此时的研究风格被马丁·杰伊誉为“咖啡店马克思主义”，已经呈现出兼容并包的雏形。

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格吕堡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启了批判理论。在其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当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当中，霍克海默指出，格吕堡的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调查仍然是他的兴趣所在，但是他试图以更加激进的历史和理论模式来讨论理论和社会研究的作用<sup>[7](P32)</sup>。霍克海默演说的主旨是社会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他运用社会哲学来试图解释人的命运，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个体。同时，霍克海默接受社会哲学的

传统问题的重要性，诸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化的意义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之间的关系，他还反对这些问题的纯哲学的研究方法<sup>[8](P40)</sup>。他明确提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而揭示和阐释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

在具体的论述中，霍克海默指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到黑格尔那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社会哲学那里，个体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整体，但整体根本不关心个体的幸福和善。19世纪以来，随着科技和工业的进步，在社会整体形成的过程中，整体对个体越来越少了任意性和不正当性。当前的社会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种趋势的转型，所以要求将哲学和科学等知识分支融为一体，特别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和文化领域之间变迁的关系。这正是用当今的方法对旧有哲学问题——特殊理性和普遍理性、生活和精神之间关系——的重新阐述。霍克海默还强调，这种重新考察和研究必须建立在更加严格的基础之上方可进行，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各个特定社会集团和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特别要考察工人阶级的状况。

霍克海默熟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他对建立和领导社会研究所去开创能与理论中的哲学思考和经验主义相并列的有计划的工作领地显得从容和自信，因为他倡导一种十分严谨的研究方法。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忧郁之情表示扬弃，他带着希望的口吻说，他的研究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意义和理性，从而真正服务于人类。他的侧重点还在于，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漠视人类的苦难，他对哲学家漠视人类的苦难表示谴责。

霍克海默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读时，就明确表示哲学即生活的哲学观，“哲学不是认识的形式法则，那根本无关紧要，而是对我们生活及其意义的实实在在的证明，这才是我们必须追求的”<sup>[11](P39)</sup>。霍克海默坦言，他的研究就是保存和传达革命信息，因此，他的目标是继续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但是，他主张研究的方法却比他的前任来得更加可靠和可信。“各种因素的有趣联合印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霍克海默尝试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途径是利用‘资产阶级’科学领域的现代发展；他将卢卡奇

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揭示出来的哲学因素与舍勒在哲学中引入大量经验知识的综合工作联系起来——他这样的结合的依据是这样的学术背景：即马克斯·韦伯和海德格尔均反对思考在世的前存在意义和人类的超历史本质。”<sup>[11](P32)</sup>也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人的现世的困惑和苦难，批判人的诸种历史困境，力求探索确保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在哲学层面投射对人的关怀，抛弃了批判哲学目的性在其他方面的虚无和盲目。

在具体的方法论上，霍克海默主张“有必要整合学科，因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劳动分工是如此的先进，但同样，其结果也是如此的分散。任何哲学或单个的科学都不能保证独自发现事实的本质所在”<sup>[18](P39-40)</sup>。霍克海默主张跨学科研究，主张“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彼此永恒地结成伙伴关系，去做真正的研究者所作的工作，也就是以最精良的方法去探究伟大的哲学问题。研究者必须重新制定哲学问题，使它们更加精确，设计新的方法处理具体问题，同时不会对普遍性问题失察”<sup>[18](P41)</sup>。在《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刊号的“前言”中，他再次强调了研究所综合的、跨学科的特性，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在沟通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sup>[9](P35)</sup>。虽然力主方法论的革新，但是，霍克海默还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的批判”。除了就职演说之外，霍克海默在1930年还推出了两篇论文——《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和《哲学的社会功能》——从方法论上为批判理论张目，即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事实证明，法兰克福学派在随后的研究工作中大胆吸取各个学科的精华，综合创新，推出了一批批的理论成果。

### 三、批判理论的论域

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又亮出了鲜明的批判靶向和方法论，那么，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底指向了哪些问题？事实上，批判理论的论域是多维的，关涉到诸多领域，如意识形态、家庭和个人、社会心理、社会一体化、大众传媒、艺术、美学和大众文化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主将是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他们秉承对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批判的使命的同时，各自在不同的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认识论和阶级论的角度

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理论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即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说成是全民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他们对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解读，即脱离社会物质经济基础来演绎意识形态。霍克海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路径，深入批判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解释。霍克海默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基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核心是对脱离特定阶级来谈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以及基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背后所承载的绝对秩序对人发出的绝对指令。霍克海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现在的解释越是变得唯心主义的，它就越是要回避物质需求的经济原因，而且去找寻所谓‘人类生存的基本成分’这种心理学上的天真的思索。”<sup>[15](P54)</sup>霍克海默还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的形式就要发生改变，如果要保持其形式的不改变，就要诉诸暴力来维持旧有的意识形态，那么，新旧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可见，霍克海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击碎了形而上学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虚妄。

霍克海默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对经验主义也持鲜明的批判态度。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定既定的社会现状，淡化人的主观能动对社会现实的改造，最终沦落到理念至上的柏拉图主义的老套路上。霍克海默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深表关切，更为人们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无为状态深表焦虑。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主宰和人的集体懈怠，霍克海默力主改造传统理论的社会功能，张扬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既勇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既存秘密，又以追求社会的合理状态为使命。

在进行总体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理论构建的同时，霍克海默也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兴理论和学科的具体结合。其中，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及时地进入了霍克海默的研究视野并得到了创造性运用。弗洛伊德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人的潜意识和与之对应的自我。他强调潜意识的巨大作用，性的原始驱动在人类行为当中的本原性作用。怎样把精神分析和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呢？霍克海默认为：“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是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的当代心理构制有所认识。”<sup>[15](P51)</sup>霍克海默并

没有照搬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分析术语,而是创造性地采用“精神的水泥”这样一个综合经济、文化和心理批评的批判范式来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在整个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力图揭示精神观念的“附着性”:人的心理机制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维护和发展的作用。同时,霍克海默也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极端观点,即把“性冲动”——“力比多”无限放大并绝对化。以此为契机,霍克海默批判把“人的本性”论绝对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即批判“本性论”的超历史性和机械决定论。他指出:“人的本性既有‘延续性发展’的一面,又有置身‘结构性变革’的一面,这就从辩证分析的方法论意义上指出‘机械进化’观和‘哲学人类学变种’观的片面性与局限性。”<sup>[10](P62)</sup>

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启发,弗洛姆则扬起了“人格心理批判”的大旗。他和霍克海默在心理分析的方法论上是有区别的,两人运用精神分析来解决问题的倾向性也是不同的。霍克海默运用心理和经济、文化、政治的综合分析模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充实批判的理论力度。弗洛姆注重纯正的心理分析,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弗洛姆特别看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强调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和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一切经济和社会现象。弗洛姆十分看重精神分析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增益效应,认为弗洛伊德“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和分析决定人类若干行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力量……不仅如此,他又揭示这种非理性现象遵循某些规律,从而可以理性地理解它们”<sup>[11](P21)</sup>。弗洛姆在1929年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报告——《精神分析在社会学和宗教研究中的运用》,认为“最重要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心理机能的发展(尤其是人类的自我构成)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sup>[12](P269)</sup>。

弗洛姆创造性地运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人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弗洛姆认为,“自由对现代人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他摆脱了传统权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变得孤独而软弱,变成外在于自己的目标的工具,与自己与他人相疏离……惟有人掌握了社会,使经济机构为人的幸福服务,惟有他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过程中,才能克服正使他陷入绝望的东西,即他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sup>[13](P233)</sup>因此,逃避自由成了人们必然的选择。消极的逃避自由的方式就是克制孤独和寂寞,

压抑个性,最终却迷失了自我。逃避自由的积极方式是爱自己和投入工作,只有这样,个性才能树立和完善。一个人真正的自由就是完全不受约束地自我表达和自主地开展行动,并且要对个人真实的情感进行真实的反应。消极自由是单纯地克服孤独与软弱,而“积极自由”是发挥个性,进行创造性劳动。积极自由必然与人发生真正的联系。在自发的自我实现中,人重新把自己和世界联结起来。积极自由一旦取代了原来的秩序,就会给人们提供新的安全感。

美学和艺术批评也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支点。美学和艺术批评源于学派对物化和异化现象的批判,以此来抵抗日益严重的技术理性和经济权威对人的挤压、限制和迫害。为此,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分别撰写了《美学理论》和《审美之维》,他们力图假借艺术和美学的救赎功能,来阻滞物化和异化现象对社会的戕害。他们寄托于艺术和审美的超然物外的乌托邦性质,对现存的世界表示质疑和抨击。“对幻想特别是体现在伟大作品中的幻想的强调和对实践的关切,是批判理论拒绝把现在永恒化而转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两个表现。对此,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及其成员都是完全一致的。”<sup>[9](P93)</sup>

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流行文化的商业化趋势也同样痛心疾首。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文化正在沦为“商品拜物教”的牺牲品。霍克海默指出“家庭”是文化和艺术没落的背后推手。马尔库塞激烈批判“肯定的文化”的商品拜物教的属性。基于“商品拜物教”的概念,阿多诺则演绎出流行文化的消费属性和商品属性。法兰克福派的理论家们对流行文化的标准化和整齐化倾向深感忧虑,他们认为标准化和整齐化是流行文化没落的前奏,因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应当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正在以贬损艺术特性为代价来迎合大众低俗的追求,消解人们对高尚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反抗和超越,更便于统治阶层对大众的控制和管制。究其实,艺术和审美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机器对人控制的有力的工具之一,沦为工具理性的有力帮凶。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各成员还有力地批判了启蒙理性、权威人格,并就社会家庭诸多问题进行了真实和有效的问卷和田野调查。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的论域是多维的,也是深入的。

## 四、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发轫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犹太性决定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初衷,尔后,学派承续马克思主义并发扬光大,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形成了人本主义的批判特色。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的方法论上综合百家,跨越学科藩篱,在批判理论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偏离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主线。

### [参考文献]

- [1]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M].孟登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 Jean Paul Sartre. Anti-Semite and Jew [M]. George·J·Becker, New York: New York Press,1965.
- [3] Carl Gru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 der Universitat Frankfurt am 22. Juni 1924 [M].Frankfurter:Frankfurter Universita-tsreden Verlag,1924.
- [4]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5]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6]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
- [7] Davi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 [8] Horkheimer. Die gegenwa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tituts fur Sozialforschung [A]. Horkheimer.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C].Frankfurt: Athenau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2.
- [9]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0] 陈士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 [11] 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 [12] Erich Fromm. Die Anwenngung der Psychoanalyse auf Sozi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J].Zeitschrift fur Psychoanalytische padagogik,1928,(6).
- [13] Erich Fromm. The Fear of Freedom [M].London:London Press,1942.

[责任编辑:戴庆瑾]